

教育惩戒中的严慈相济策略

◎吴国建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正式实施，给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对改变“教师不愿教、学校不敢管”的现象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惩戒不是目的，规则也非万能，只有正确掌握使用的度才能达到有效教育的目的。如何掌握呢？严慈相济是最基本的教育策略。

慈就是爱，它是教育的“灵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理解。犯错误是孩子成长必经之路。学困生会犯错误，优生也同样会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孩子是需要被理解的，犯了错误的学生更渴望被理解。我们要理解孩子的这种心理，要做的是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

二是保护。绝大多数学生犯的错误与道德品质无关，而只是行为习惯的问题。学生由于家庭教育、个人身心特点等的不同，导致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处事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状态各不相同。一旦处理不当，会给学生的心灵带来伤害，影响一生。从保护孩子出发，我们绝对不能动辄上纲上线，也不能将问题公开化、扩大化，要尽量缩小到知情人的范围。

三是等待。学生处于生长发育期，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迷惘困惑，甚至会很无助。尤其面对错误，面对因自己的过错而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学生会陷入后悔及想弥补但不知所措的状态。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相信学生是一定愿意改变的，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转变。

四是清零。犯过的错误可能会让学生有心理阴影，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恐惧，对教师同学的疏离。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清零意识，要将他们的错误及时清零，不仅在文字记录中清零，更要在教师头脑中清零、行动中清零，确保让犯错的学生不再感觉矮人一等，重新恢复自信。

教育惩戒中，“严”又在体现在哪儿呢？

一、严格的制度体现了刚柔两面，刚的一面是对违反者的惩戒，柔的一面是对遵守者的保护。学校应当通过集会、班会等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学学习，让相关制度入脑入心，让学生明白制度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可组建学习班定期集中学习《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学校的相关管理制度，学习先进典型和身边的好人好事，通过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学生对制度条例的敬畏，引导他们学会对自我过往的反思，从而促使他们提高对自己未来的要求。要通过考核对学生的制度学习进行监督，以防学习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要分类执行。要根据错误的性质分类执行。对于严重违纪的学生，我们要勇于批评敢于惩戒，如涉及身心伤害的校园欺凌、涉及品德诚信的考试作弊、涉及他人利益的偷窃行为、涉及国家社会学校的大是大非问题等，这些是学校管理的“高压线”，对这些错误的个别处理，就是要形成全面的高压态度，让学生“不能犯、不敢犯”。而对于常见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学生，可以通过“德育积分制”让学生明白达到什么样的“积分”就会得到怎样的惩戒。

三、要持续跟踪。教师对违纪学生的批评与惩戒，更多的是表达以点带面、教育为主、恨铁不成钢、防患于未然的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良知。教育惩戒的目的是帮助改进，宣布了惩戒只是开始，惩戒的效果往往需要持续跟踪，长期关注。如果发现学生在接受教育惩戒以后有所反省、有所改变，应当给予表扬鼓励；如果学生在接受教育惩戒后依然不变甚至继续违纪违规，则必须给予更加严厉的教育惩戒，既可以延长惩戒时间、提高惩戒等级，也可以征求家长同意后请家长参与教育和管理。

四、要设立阶段汇报。对于严重违纪的学生，在惩戒期内实行德育导师制。学校给严重违纪学生配备导师，并明确要求学生定期向导师当面或书面汇报思想情况及具体表现。导师一般由班主任或任课教师担任，导师可根据学生思想汇报和具体表现给予客观评价。如果评价较好，则可由导师提出减轻惩戒的建议；如果评价较差，导师可向学生明确提出整改要求，也可向学校提出进一步加重惩戒力度或延长惩戒期限的建议。

（作者系花园外国语学校常务副校长兼高中部部长，特级教师，曾获中国数学教育最高奖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是全国数学竞赛优秀教练员，浙江省高考命题组成员，曾任东阳二中校长、东阳中学副校长、国内K12上市教育集团校长等。）



4月9日，花园幼儿园来到花园村天香湾景区举行以“学会生存能力 孩子终生受益”为主题的小狼探险队徒步历奇野营活动，通过体验“宝盒解码”“解密南北”“紧急救援”等游戏环节，掌握植物观察、路标学习、户外救护以及指南针使用等生活生存技巧，为孩子们提供接触自然、探索体验的机会，全方位提升儿童的生存意识、生存能力和生存态度，培养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自主能力的“社会人”。（本报记者周振平摄）



中国共产党是“九一八”抗战的中流砥柱

编者按：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重温历史，走向复兴。本报特开设“风雨兼程 百年党史”栏目，刊发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重大党史事件以及重要党史人物，以飨读者。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长期以来该论断主要基于“8年抗战”体系而非“14年抗战”体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贯穿“14年抗战”始终。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九一八”抗战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正如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所写：“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发表《9·19宣言》：中流砥柱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共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当夜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9·19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等等。《9·19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

以往众多论著中，很少提及《9·19宣言》，而着力突出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应该说，两篇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并可以“作为大的历史运动坐标”的事件，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一在于该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断在了抗战起点上；二在于该宣言的发表恰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三在于该宣言初步奠定“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

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

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需要以中国抗战视角，更需要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角。“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的远见和魄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加深认识。

坚持武装抗战：中流砥柱的核心

日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史》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著名抗联将领冯仲云早在1946年即完成《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奋斗简史》。

提起抗联成立时间，最普遍的回答就是1936年。那又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最新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

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其二，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常见“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其三，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九一八”抗战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作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没有武装斗争实践为基础，抗战理论无从得到发展。“九一八”抗战筑起了血肉长城，也提供了系列理论源泉。

推动统一战线：中流砥柱的纽带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九一八”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初，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党史

开始组织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3月开始，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

3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

5月12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4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任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十六天内，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横扫七百里，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的这次军事“围剿”。

7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亲任总司令，采取“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军三万多人在毛泽东、朱德

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从8月7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及老营盘等地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八百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9月，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经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翌年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自行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此即“柳条湖事件”。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0月，红二十五军成立，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

11月1日—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

11月7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抗战。近年，沈阳“九君子”和被誉为“沈阳拉贝”的国际友人联合以TRUTH（“九一八”事变后，“九君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TRUTH的铁证）为利器推动国联仲裁的历史广为传播。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医学教授刘仲明是负责TRUTH汇编的“集大成者”，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TRUTH的汇编到协调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鄂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东北抗联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战思想在军事上的延伸。

凝聚抗战精神：中流砥柱的灵魂

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抗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精神铸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诞生于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

“九一八”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11月7日—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12月14日，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下，有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12月29日，共产国际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并提出“民族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未完待续）

